

中国历代生活史话丛书

# 明清生活史话


王凯旋

李洪权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历代生活史话丛书

# 明清生活史话

王凯旋 李洪权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 阳 ·

© 王凯旋 李洪权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生活史话 / 王凯旋, 李洪权著.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7.1

(中国历代生活史话丛书)

ISBN 978-7-5517-1438-9

I. ①明… II. ①王… ②李… III. ①社会生活—历史—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8742 号

---

出版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号巷 11 号

邮编: 110819

电话: 024-83687331 (市场部) 83680267 (社务部)

传真: 024-83680180 (市场部) 83687332 (社务部)

网址: <http://www.neupress.com>

E-mail: [neuph@neupress.com](mailto:neuph@neupress.com)

印刷者: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发行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235mm

印 张: 14.5

字 数: 237 千字

出版时间: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组稿编辑: 文 韬

责任编辑: 李 佳

责任校对: 叶 子

封面设计: 刘江旻

责任出版: 唐敏志

---

ISBN 978-7-5517-1438-9

定 价: 49.00 元

# 前 言

明清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个朝代，既总结前代的历史，又迎接近代的曙光，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过渡特征。与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相适应，明清时期人们的生活既恪守传统，又有所变化。这些新旧杂糅的生活图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明清历史生活画卷。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描述明清时期社会生活的。它不仅包括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也包括明清时期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生活等。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通过客观描述明清时期的生活片段，向人们展示这一时期概略的生活情景，因而在写法上以个例为主、以议论为辅，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以便于读者一目了然。

本书是在学习、吸取学术界诸位学者大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我们虽然对明清时期的生活史很感兴趣，并且相应地做了些整理和研究工作，但由于才疏学浅，对这个领域无论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难以熟练掌握。幸好近些年来学术界有关这一领域的成果不断面世，才给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特别是冯尔康先生的《清人生活漫步》和冯先生与常建华先生的《清人社会生活》两部大作，更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在书中多处

采用了业师梁希哲先生的学术成果，先生严谨治学、奖掖后进之风令人敬仰。正是学术界学者大家们的辛勤劳动，才使我们这本书有了立足的基础，否则，是无法在短时期内完成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对一些原始资料进行了加工处理，为方便读者阅读，没有一一标明出处。书中有的篇目还引用了一些明清时期野史、笔记、小说中的奇闻轶事和故事情节，这些文献的征用可补正史之不足。鲁迅先生说，对于中国历史“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因为它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那么，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是杂说”（《华盖集》）。我们对明清生活的认识和本书的写作也是以此为为基础的。我们认为，明清生活的广阔画面、真实自然的社会生活，许多即来源于此。

此外，本书的图片资料均来源于相关著作，如林金树先生的《万历帝》，周远廉、赵世瑜先生的《多尔袞全传》，林延清先生的《嘉靖皇帝大传》，姜守鹏先生的《洪熙帝、宣德帝》《名胜新闻百图》《民俗风情二百图》《中国历代服饰》，刁书仁、赵光元先生的《成化帝》等。

我们的意图是提供给读者一部清新流畅的通俗学术读物，于雅趣中见历史之真相，于真相中稽历史之脉络。鉴于学力有限，加之时间仓促，许多问题尚需深入研究与拓展，敬请读者诸君教正。共勉学术，读者为师，是我们真诚的愿望。

著者

2016年8月

# 目 录

## 第一章 明清文化生活

明代的士风 / 2

明代科甲多出江南 / 10

明代讲学风之盛 / 17

明代科举生活 / 24

清代私人刻书藏书 / 31

清代的皇子教育 / 37

清代的士风 / 46

## 第二章 明清社会生活

明代廷臣的绰号 / 54

明代世风 / 60

明武宗逸事 / 66

《金瓶梅》里的奴婢 / 71

明代的菜户 / 78

- 清代的宗族 / 84  
雍乾轶事 / 89  
和珅其人 / 95  
乾隆惩贪纪事 / 102  
清官于成龙 / 115  
乾隆六下江南 / 121  
木兰围场与避暑山庄 / 129  
扬州八怪 / 137

### 第三章 明清经济生活

- 明代的官俸 / 148  
明代的典当 / 156  
明代的晋商和徽商 / 161  
《金瓶梅》与市井文化 / 167  
明代的旅游文化 / 173  
明代民间旅游业 / 178  
八旗生计 / 184

### 第四章 明清民俗生活

- 明代婚姻的嬗变 / 192  
明代的酒文化 / 199  
明代的茶艺 / 204  
清代的服饰 / 208  
清代民间的婚姻 / 216

第一章  
明清文化生活





## 明代的士风

从明初到明亡，明代士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明初到万历时期，一是万历以后。在每一个过程中，都有细致的渐进过程，表明士风是一点一点走向复杂和堕落的。作为士人个体，有着丰富多样性，其爱好、性格、情趣千差万别；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好恶、精神、品格反映的是时代面貌和时代特色，即在一定的时段里，其价值取向、生活情致、思想观念有着大致相同的发展方向。尤其在封建社会，我们几乎可以把士习士风看作社会是否安定的“晴雨表”。

### 一

明初，太祖朱元璋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注意对全民的教化，把程朱理学确定为国家的统治思想，用它来治理人民，敦化风气，培养全民尤其是士人（即知识分子）的忠君爱国观念。因为在封建国家社会结构中，士是四民之首，而且被认为是秀民，是社会道德良知的标识，是民风民俗学习与形成的表率。更为重要的是，士是国家官僚队伍的重要后备力量，其素质的好坏、水平能力的高下，直接关系到士风的好坏和政治是否清明。所以，政府非常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育，与之直接相关的就是国家的科举制度及教育制度。明代既然以程朱理学为教育的指挥棒和范本，知识分子就必须紧紧围绕理学来学习和做学问，登第取士也注定成为国家的服务工具，尽量地消除个体性和棱角，做朝廷忠顺和卑微的奴才。

士在不掌握政治权力的时候，是不去承担“社会良心”的责任的，由于没有力量，对社会的任何批判都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一旦入仕，他们就要面对是尊君还是尊道的选择。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是儒家弟子，以天下为己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作为君主之臣又必须服从君主的命令和规定，成为不折不扣的走卒。这种选择有时是极其艰难的。为了维护“道”，在必要时，士人会舍弃自己的生命。此

外，知识分子依靠国家的俸禄生活，为了这份薪水，他们得被迫屈从皇权，丧失自己的一部分尊严和独立人格，这就使他们有时不得不向人取媚，想保持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完好无损是不可能的。

士是官僚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官吏是统治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平时所说吏治的好坏，就是直接与仕风相联系的，仕风的决定部分正是士风。吏治的好坏往往反映的就是士与君主和王朝的关系。像一般的下层官吏，他们直接负责管理人民、教化乡里，是国家与平民之间的主要纽带。他们和朝廷里的大臣们一样，在明初时都是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的，这与明初皇帝的严格要求有关系，也与新王朝的富有生气相关。

作为一个刚从动乱中走出来的王朝，明政府苦心经营，太祖、成祖颇有作为，尤其是不久还出现了仁宣之治，促使官员们对这个王朝比较忠诚，也比较敬业，他们也为这种局面的出现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与这个王朝休戚与共，为其尽忠、奉献、服务和约束自己，即便明代的官俸偏低，也尽力地克制自己，努力为国家办事，这是比较不容易的，反映了当时士风的朴素和坚定。这种相对稳定的士风一直保持到明正统年间，由于出现了宦官专权的现象，政治上发生了一些混乱。以后的宪宗皇帝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混乱，任用宦官和奸佞，致使局面向不利的一方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士风仍然保持着几十年来培养的良好素质，大部分士人忠君爱国，仍以名节自励；但已开始有相当一部分士人趋向逢迎阿谀，结交权贵。比如，宪宗时期的阁臣万安，不但极力巴结宪宗的宠妃万贵妃，还致力于巴结内侍，给皇帝上书也很少讲国家大事。后人在整理宪宗物品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篋，里面都是万安给皇帝写的密折，内容竟然都是关于房中术的。

有一个两个这样的阁臣，在总体上并没有对明朝政局产生太大的恶劣影响，因为大多数朝臣和内阁要臣还是比较正直的，能够秉公办事，一心为国为家，而且政绩也非常出色。如天顺、成化年间的李贤、商辂、岳正、吕原、刘定之等人，他们在位的时间或长或短，但都认真负责地做事。像李贤，他是当时非常有名望和威信的大臣，办事有手段，也讲究服信众人，在奖励人才和整饬朝纲等方面都有突出作为，还提拔了许多有能力、有胆识的下级官僚，以后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再如岳正，在天顺年间入阁，尽管任职时间不长，但堪称敢作敢当、尽心尽

力。有一天，他在朝廷上与皇帝大臣们一起论事，讲到慷慨激昂处，唾液飞溅到皇帝的身上。他对皇帝可谓忠心耿耿，但在那种官员流动性非常大、动辄被一点小事牵连并获罪的封建政府里，还是很容易被一脚踢开或遗弃的，他后来就因为某件关于结党的事情而被皇帝贬到了地方上去做官。有一次，英宗皇帝想起了他，很是怀念，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岳正这个人啊，挺好的，就是胆子大了些。”这话传到了远在边地的岳正的耳朵里，他非常感动，认为就此死去也值得了。可见其虽然被皇帝抛弃，但还是一片热诚，就因为皇帝心血来潮的一句话竟然激动不已。

在当时，像他这样的官员很多，于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他在英宗朝前后任职，尤其在发生“土木堡之变”的时候，勇敢地承担起国家危难时的重任，率领军民保卫京都，艰苦卓绝地取得了对瓦剌也先军队的战争胜利，支撑起了明朝最艰难时期的政局。但因为他没有坚决地支持英宗复位，在这个问题上导致了自己最终的被杀。在他死后，复辟的英宗派人去他家里搜查，仅仅在正屋里发现了锁得严严的柜子，打开一看，只是景帝赏的衣物而已。

可以说，一直到此时，朝廷里的士风仍然都是比较好的，官吏们廉洁奉公，直言敢谏，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正直气节和风骨。他们爱国爱己，为了心中的至高信仰还在努力工作和奋斗。此时，明朝已经开国一百年，经历了许多内忧外患，但士人们仍基本同心一致，维护国家统治秩序，避免国家朝政的混乱及社会局势的进一步动荡。最高权力阶层如何争斗和更迭不休，也始终没有对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和损害。而且，朝廷里一旦有奸佞和不利趋向，言官们照旧仗义执言，不畏强权，认为拓宽言路乃是自己天经地义的使命和责任，即使因此获罪也不在意。当时人以士大夫们这种敢于抗疏论救的坚定作风而纷纷成为美谈。我们今天从明代的《实录》中可以看到，敢于直言上谏的记载到处皆是。这表明，朝野上下整个士人集团还都是处于一种奋发向上的氛围中，社会上升的势头比较强。

## 二

到了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年间，这种尚称良好的势头被破坏

了。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政治局势、社会主流思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它们的恶性作用下，士风不可能不发生巨大转变。

在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生产规模扩大，生产力提高，而且商业往来和商业流通日益频繁，许多市镇迅速兴起，这些都刺激了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社会风尚的急剧变化，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体现得很明显。违禁逾制的事情频频发生，崇尚奢侈的生活，挥霍无度，竞相攀比等等。这些必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产生极大的影响。社会上普遍重视起商业和商人的地位，崇拜金钱和财富，连许多士大夫都忍不住去经商，社会上关于弃学从商的事例就更多了。

在明初的时候，政府把程朱理学奉为官方之学，加之其对社会的思想统治比较严格，社会思想没有太大的异动。而中后期，王学兴起，它抛弃了理学僵化的束缚，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性，客观上起到了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作用，在社会上占据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促使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都被重新审视和思考。在这样的冲击和震荡之下，士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思想、行为上被迫发生变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明中期百年来，明朝政局总体上是向着下坡路走，这时朝廷政局发生的一些大事，更成为促使士人士风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

在正德年间，武宗信任身边的宦官，不理政事。他每天都在宦官的陪伴下寻欢作乐，宦官们掌握了很大的势力，号称“八虎”，排斥和打击朝臣势力，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大臣们联合上书揭露“八虎”的罪恶，要求将他们正法。武宗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打算处理掉身边的宦官；但此



事让宦官们知道了，他们趁着自己贴身皇帝的机会，对武宗连哭带闹，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迫使皇帝临时又改变了主意，转而去逮捕主要提议此事的朝臣。大臣们的正直势力被挫败并有所损耗。但此事并没有就此完结，怀恨在心的宦官们借机开始报复，尤其以握有大权的太监刘瑾为首，他们仅在前后三四年内，就寻机打击、迫害了七百多名官员，或廷杖，或削职，或下狱，或降级，或凌辱，或罚俸，采取了各种可以做到的办法来整治朝臣势力，使大臣们饱受摧残。比如，正德三年（1508）夏天的一次早朝，刘瑾发现大殿里有一封匿名信，指责他有不法行为。他非常生气，伪造圣旨让大臣们在奉天门下跪，自己当场在那里询问和追查写信人，因为一直没结果，就一直让大臣们在那里跪着。在酷暑之下，有被晒昏的，更有人被当场晒死。

应当说，朝臣们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丝毫无错的，他们从维护皇朝的大一统出发，反感和限制宦官势力的发展，是正当行为，更何况明太祖时期就已经明确下令不许宦官干政。但在刘瑾掌权期间，朝臣们在心灵和肉体等多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迫害，意志已经有所涣散，忠君爱国之气大为受挫。

经过这样的事，按理明武宗应该有所警惕和转变才对，但他照旧我行我素，不但毫不检点，更是变本加厉。尽管有责任心极强的朝臣在一边不断提醒和敦促，他却对之不予理睬。发展到正德十五年（1520），皇帝竟然要以大将军的名义南巡，大臣们忍无可忍，集体加以规劝。明武宗勃然大怒，下令把相关的官员统统下狱或罚跪，事态向着激化方面进一步发展，双方都互不相让。结果是，大批官员被贬官、夺俸、廷杖、戍边，官员们用一腔热血所换来的只是屈辱。

发展到嘉靖时的“大礼仪”事件，它彻底地毁伤了朝臣的心。正德皇帝没有子嗣，由嘉靖即位。嘉靖是正德的堂兄弟，他的父亲兴献王是正德皇帝之父明孝宗的弟弟。嘉靖皇帝执意要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行尊奉典礼，而这是不合乎封建正统规定的。于是，皇帝与朝臣之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长达十余年，是为“大礼仪”。其关键只在于：世宗嘉靖皇帝究竟是继嗣还是承统，称孝宗为皇考还是皇伯考，对兴献王和王妃的尊号怎么定等问题，大臣们太死板不讲变通，皇帝又太执拗不肯退让，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朝臣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妨碍了以后必要的君臣沟通；皇帝心灵早成阴影，与大臣交恶。在嘉靖一朝

几十年内，奸佞和柔媚之徒屡出，极大地扰乱了朝政，严嵩等均是这一期间掌权上台的。嘉靖后期，朝政一片黑暗，阁臣倾轧不停。

接连的打击，使士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沉重的创伤。他们绝大多数人忠诚地维护这个政权，一片赤诚地为这个政权着想，却不料，这个政权已经腐朽到了不但不领情反而对这种热诚之气大加鞭挞的地步。对待朝廷越忠诚，受到的摧残越大；对这个政权越尽心，受到的打击越剧烈和痛楚。其实，肉体的折磨还在其次，精神的迫害是最重要的。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对精神的东西看得更重，期待实现的也多是纯洁和高尚的理想。极其黑暗的事实给了他们无情的一击，告诉他们不要再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这个朝廷只能虚应和敷衍了。因为他们的心已被打得满是伤痕，极其脆弱，不可能再经历更多的伤痛。他们学会了保护自己，遂开始把眼光转到了比较实际和功利的一面。

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变。若说在此之前，士人们还对社会和政府有什么期望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几乎就消失殆尽了。他们以极其悲凉的心态去思考人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更多地投入到了现实社会世俗生活的怀抱中。士风可谓就此大变。他们不再直言了，即使有，也是完全为名为利；他们不再认真做事了，做出好成绩又不会得到嘉奖，不如赶快趁机捞取一些实利，在做官任职上给自己谋取更多的实惠。有作为又怎么样，还不是辛辛苦苦一场空忙！为了谁？只有为自己是最保险的，只要在官场中讲究一些技巧，就没有任何风险。

### 三

朝廷中的士人，在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情况下，纷纷退而求其次。

阁臣唯唯诺诺而已，只是力求明哲保身，对皇帝依顺和迁就，对群下则宽大和容忍，有什么委屈也自己掖着、忍着，努力做皇帝和下级之间的一个传声筒和调和器。即使这样，也满足不了各方的要求，还是随时可能被挤出内阁。以万历时期的申时行为例，他在内阁首辅的位置上苦苦挣扎了八年，不是不想建功立业，但苦于皇帝擅权独断，朝臣又肆意攻击，同僚之间不但不能同舟共济，反而鹬蚌相争。想有所作为也是举步维艰。

言官们则视情况的不同，决定是否直言上谏：有利有名可图的话，就说一说；不愿意的话就不张嘴了，沽名钓誉的心态已经大大超过了忠君爱国。古往今来，中国的士人们一向是极其重视自己的名声的，他们当然也要高官厚禄，但更看重树立完美的道德榜样，看重青史留名，以立德、立言、立功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唐太宗与魏徵的佳话就始终为他们所津津乐道，做一个魏徵那样的士人和官员，把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就实现了他们最真实的梦想。所以，在有明一代，士人们上书言事的风气都是很普遍的，包括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朝堂上据理力争，一次又一次地又在朝堂上痛哭流涕，都不过是为了从对朝廷的忠心里体现自己的价值，在客观上获得敢谏敢言的好名声。在明代中后期，他们的这个愿望之实现也是比较困难的了。比如嘉靖皇帝，故意把许多攻击自己的上书压置不理，就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有人想借机留名，他不想让这些人的得逞。而且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人是以直言敢谏作为成名手段的：弹劾谁，则极尽夸张之能事；攻击谁，则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甚至会故意制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来陷害别人。

朋党之争也掺杂上述那样的明争暗斗，好同恶异，意气用事，毫不考虑国家的危难境况，包括东林党，也是目光短浅，与对立党派冤冤相报，只顾眼前利益，不去真正挽救时局。但在当时，以东林党为首的一部分士人，结社议论朝政，开展积极的社会批判运动，毕竟还算是好的，因为个人的力量已经显得极其微小，在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必然要求群体力量的联合，即使它远离政治权力，也最终要回归于政治权力，乃至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权力之争。党争的士人们毕竟还是要对明亡负相当一部分责任的。

当时，普遍的贪污纳贿之风席卷了各地，从京城直到地方。尤其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现象很常见。到了天启年间，更是污泥浊水，致使士人们最终丧失了自己的“平天下”理想，化解了自己的正直崇高人格。许多人依附阉党，出卖灵魂，蜷缩在庞大的宦官集团势力之下，以谋求一己私利。像廷臣顾秉谦，借助魏忠贤的势力做了内阁大臣乃至首辅，对魏忠贤一味地奉承曲迎，在票拟圣旨的时候，件件都按照魏忠贤的意思来办。朝廷里有什么事，也都归功于魏忠贤，并亲自写文章褒扬魏的辛劳。他这样的人，士无节操，随风而倒，谁得势就跟着谁，占当时士人的大部分，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士人的人格泯灭，其自私和势利之

心被充分体现出来。

坚持不去随波逐流的士人已经很少很少，这极小的一部分人，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担起了匡扶正义和社会良知的重任。他们中的代表是相当多的东林党人，如顾宪成、杨涟、左光斗，勇敢地对抗阉党势力，态度强硬，也使得魏忠贤等弄权时有所顾忌。他们的这种精神值得钦佩，但也不是没有错处，因为太固执和不宽容，也就同时为自己树立了无数的对头，成为众矢之的。兼之他们又一味地以澄清天下自诩，矫首犯权，就势必把自己逼入极端之地不能得救，从而不得不做悲剧的扮演者，结局都极为悲惨。他们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清正人格和操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探讨其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对这个业已腐朽的政权太忠心，爱得太迂腐、太热烈，他们用献出生命做代价，换来的还是对时世和君主的不清醒认识，这份鲜血是白流了。

在社会上有许多人，为了免受这一耻辱，或超脱于社会，或消极地从社会逃遁，毅然放弃了官场生涯，做了名士、隐士、狂人或山人，一生游乐山水，不再出仕。汤显祖就是个出过仕的大名士，在政治上屡受挫折，便辞归故里。他们的心里其实非常痛苦，或者性格行为不能被社会规范和传统价值观念所见容，或者即使远在江湖，也不一定摆脱得了对国家和朝政的关心，在享受世俗生活的同时，心情也许很沉重，理想终生不能实现，便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寻求解脱。很多人选择了虔奉佛道，所以明代士人求禅问道的风气很浓，也反映了一种在探索无望的情况下归入宿命的思想轨迹。

当然，我们不排除有的隐士是欺世盗名，但更多的人是真诚地想超越这个社会去寻求人生意义的，他们重义任侠，急人所急，并不能在逃避社会的过程中真的抛弃一切东西。他们的狂放和傲慢都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放荡稀奇的行为本身就是对社会和传统的一种反抗方式。

更有众多的士人，不但乐于和商人交往，还积极地去从事经商活动。他们重视物质生活和物质享受，把满足物质生活看作紧要和基本的事情，提出了学者也要以治生为本的主张，并且亲身参加实践活动。明末小说《三言》的作者冯梦龙就是一个有名的刻书家，当时的小说像《二拍》之类的内容里更是充斥着有关学人经商的描述。这表明，在社会转型阶段，大量士人已经从皓首穷经中走出来，走向了无比现实的商品经济生活，自己保障自己的日常生活经济来源。这种情景只有在明代





中后期才出现，此前很少有，此后也很罕见。

明代士风，在弘治之前总体还是较好的，士人铮铮敢议，士风质朴厚重，是一幅比较恢弘的图景。而在正德、嘉靖以后，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随着整个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的病态运转，士风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遭遇多次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遂日益涣散，分流发展，在朝在野的许多人都认清了官场的险恶沉浮，改变或放任了自己的人生观或价值观，实行独善其身的人生归宿方式，埋葬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最高理想，弃节改操，堕于人欲横流，或趋炎附势，或欺君害国，或玩世自放，或怡情自足，社会上已没有什么可以对他们的道德真正进行挽救的学说或实践；理论思想的坍塌、政治的黑暗失调、社会人心的迷茫失落，都促使明代士风逐渐走向堕落。对往昔场景的任何形式的回头，都会让那些曾经壮志满怀的士人们潸然落泪。

## 明代科甲多出江南

区区东南一隅，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中一马当先，科第蝉联，屡创佳绩。这个地区的进士以其数量多、仕宦显、名次前而具有突出的特征。作为一个最为知名的地域文人集团，他们有着“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的自信气概，其志在必得的自期之志为天下人所瞩目。

确切地说，“东南”一词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涵盖的地域虽然有所差别，但就一个相对独立而自成体系的地域文化来说，它主要是指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甚至江西的一些地区，大部分都在古运河以东。原本就人杰地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大迁徙使大批文人南迁，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东南士人集团，文风浓郁、秀士之多无处可比。自宋元以来，大运河的修建沟通了南北，更成为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一座桥梁。东南依江傍海，绝大多数地区交通便利，境内水系纵横，河湾密布，舟楫穿梭灵活，文人彼此交流方便，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进士大量地从此地崛起，乃是非常合理自然的事情。虽然人文的盛衰固然不是由环境因素主导的，但钟灵毓秀的优美环境客观上是可以吸引四方之士前来汇集的，不但沟通方便，还使各界名流相互促进，高人们不断争奇制